

女權教育被口口口水淹沒

□王攀

好」，達到事業家庭雙豐收。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算女大學生自己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應該說，這是一堂標準的女權教育課，它的目的是讓女大學生自信自立自強。但很遺憾，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與會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上。

的確，在談感情變得奢侈、「談錢」大有壓倒「談愛」之勢的現實裡，女大學生「傍大款」不僅成爲一種現象，人們也往往容易爲之找到各種聽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愛錢」結合，「傍大款」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吳啟迪所言「傍大款」，是「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觀念的體現。

其實，在新聞裡，除「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外，吳啟迪還談到「女孩子化妝低齡化，甚至到了四五歲的年齡」。而這兩點，恰恰是女權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過去女權發展的一百年裡，女權覺醒和崛起的兩個關鍵內容：一是經濟獨立，二是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經濟獨立，體現較爲明顯，比如職業女性；但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並不明顯，甚至在商業女色消費時代，又有回流跡象。女大學生「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傍大款」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經濟獨立的倒流：從獨立回到依附、從社會回到家庭。而一旦沒有經濟獨立，女權意識就不復存在。

而在「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則加重了這種存在。把女性作爲一種消費對象，這是商業時代的一個大問題。典型莫過於《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廣告、時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被女權主義者大批特批的。化妝，雖然是女性愛美的表現，但也是社會把女性視作漂亮的消費對象的結果。

可以說，吳啟迪所言女大學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是女權教育的必要。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爲「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釋，爲「傍大款」找「愛的理由」，甚至列出諸多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熱鬧固然熱鬧，但無疑是偏離了主題。自信自立自強的女權教育，被淹沒在這些風一吹就乾的口水裡。

環境污染罪

□紀卓瑤

2009年7月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趁汛期偷排化工廢水污染南涑河流域，有毒廢水嚴重影響流域內50萬群衆的生命健康和生產生活。近日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15年。

應當說，15年有期徒刑與造成的危害和損失相比刑責相當。但值得關注的是，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並非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定罪，而是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

所謂投放毒害性物質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爲；而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則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導致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行爲。

乍看起來，二罪都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但構成要件卻完全不同。前者屬於「主觀故意」，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而後者在主觀方面則爲過失，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侵犯的客體爲國家環境保護和公民環境權。具體就億鑫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事件而言，明顯具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特徵。

對環境污染事件以投放毒害性物質定罪，明顯有悖「罪刑法定」原則，爲何法院審理時還要執意爲之？說到底，還是重大環境污染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責太輕。

所以，必須盡快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條文進行重修。否則，在法官審理環境污染案時難免向投放毒害性物質罪上靠，最終導致法將不法的嚴重後果。



9日，在重慶師範大學舉行的「女科學家高層論壇」上，與會的女科學家們認爲，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女大學生們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

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算女大學生自己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應該說，這是一堂標準的女權教育課，它的目的是讓女大學生自信自立自強。但很遺憾，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與會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上。

的確，在談感情變得奢侈、「談錢」大有壓倒「談愛」之勢的現實裡，女大學生「傍大款」不僅成爲一種現象，人們也往往容易爲之找到各種聽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愛錢」結合，「傍大款」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吳啟迪所言「傍大款」，是「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觀念的體現。

其實，在新聞裡，除「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外，吳啟迪還談到「女孩子化妝低齡化，甚至到了四五歲的年齡」。而這兩點，恰恰是女權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過去女權發展的一百年裡，女權覺醒和崛起的兩個關鍵內容：一是經濟獨立，二是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經濟獨立，體現較爲明顯，比如職業女性；但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並不明顯，甚至在商業女色消費時代，又有回流跡象。女大學生「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傍大款」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經濟獨立的倒流：從獨立回到依附、從社會回到家庭。而一旦沒有經濟獨立，女權意識就不復存在。

而在「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則加重了這種存在。把女性作爲一種消費對象，這是商業時代的一個大問題。典型莫過於《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廣告、時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被女權主義者大批特批的。化妝，雖然是女性愛美的表現，但也是社會把女性視作漂亮的消費對象的結果。

可以說，吳啟迪所言女大學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是女權教育的必要。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爲「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釋，爲「傍大款」找「愛的理由」，甚至列出諸多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熱鬧固然熱鬧，但無疑是偏離了主題。自信自立自強的女權教育，被淹沒在這些風一吹就乾的口水裡。

環境污染罪

□紀卓瑤

2009年7月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趁汛期偷排化工廢水污染南涑河流域，有毒廢水嚴重影響流域內50萬群衆的生命健康和生產生活。近日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15年。

應當說，15年有期徒刑與造成的危害和損失相比刑責相當。但值得關注的是，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並非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定罪，而是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

所謂投放毒害性物質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爲；而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則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導致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行爲。

乍看起來，二罪都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但構成要件卻完全不同。前者屬於「主觀故意」，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而後者在主觀方面則爲過失，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侵犯的客體爲國家環境保護和公民環境權。具體就億鑫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事件而言，明顯具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特徵。

對環境污染事件以投放毒害性物質定罪，明顯有悖「罪刑法定」原則，爲何法院審理時還要執意爲之？說到底，還是重大環境污染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責太輕。

所以，必須盡快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條文進行重修。否則，在法官審理環境污染案時難免向投放毒害性物質罪上靠，最終導致法將不法的嚴重後果。



9日，在重慶師範大學舉行的「女科學家高層論壇」上，與會的女科學家們認爲，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女大學生們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

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算女大學生自己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應該說，這是一堂標準的女權教育課，它的目的是讓女大學生自信自立自強。但很遺憾，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與會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上。

的確，在談感情變得奢侈、「談錢」大有壓倒「談愛」之勢的現實裡，女大學生「傍大款」不僅成爲一種現象，人們也往往容易爲之找到各種聽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愛錢」結合，「傍大款」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吳啟迪所言「傍大款」，是「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觀念的體現。

其實，在新聞裡，除「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外，吳啟迪還談到「女孩子化妝低齡化，甚至到了四五歲的年齡」。而這兩點，恰恰是女權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過去女權發展的一百年裡，女權覺醒和崛起的兩個關鍵內容：一是經濟獨立，二是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經濟獨立，體現較爲明顯，比如職業女性；但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並不明顯，甚至在商業女色消費時代，又有回流跡象。女大學生「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傍大款」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經濟獨立的倒流：從獨立回到依附、從社會回到家庭。而一旦沒有經濟獨立，女權意識就不復存在。

而在「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則加重了這種存在。把女性作爲一種消費對象，這是商業時代的一個大問題。典型莫過於《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廣告、時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被女權主義者大批特批的。化妝，雖然是女性愛美的表現，但也是社會把女性視作漂亮的消費對象的結果。

可以說，吳啟迪所言女大學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是女權教育的必要。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爲「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釋，爲「傍大款」找「愛的理由」，甚至列出諸多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熱鬧固然熱鬧，但無疑是偏離了主題。自信自立自強的女權教育，被淹沒在這些風一吹就乾的口水裡。

環境污染罪

□紀卓瑤

2009年7月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趁汛期偷排化工廢水污染南涑河流域，有毒廢水嚴重影響流域內50萬群衆的生命健康和生產生活。近日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15年。

應當說，15年有期徒刑與造成的危害和損失相比刑責相當。但值得關注的是，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並非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定罪，而是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

所謂投放毒害性物質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爲；而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則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導致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行爲。

乍看起來，二罪都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但構成要件卻完全不同。前者屬於「主觀故意」，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而後者在主觀方面則爲過失，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侵犯的客體爲國家環境保護和公民環境權。具體就億鑫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事件而言，明顯具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特徵。

對環境污染事件以投放毒害性物質定罪，明顯有悖「罪刑法定」原則，爲何法院審理時還要執意爲之？說到底，還是重大環境污染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責太輕。

所以，必須盡快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條文進行重修。否則，在法官審理環境污染案時難免向投放毒害性物質罪上靠，最終導致法將不法的嚴重後果。



9日，在重慶師範大學舉行的「女科學家高層論壇」上，與會的女科學家們認爲，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女大學生們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

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算女大學生自己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應該說，這是一堂標準的女權教育課，它的目的是讓女大學生自信自立自強。但很遺憾，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與會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上。

的確，在談感情變得奢侈、「談錢」大有壓倒「談愛」之勢的現實裡，女大學生「傍大款」不僅成爲一種現象，人們也往往容易爲之找到各種聽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愛錢」結合，「傍大款」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吳啟迪所言「傍大款」，是「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觀念的體現。

其實，在新聞裡，除「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外，吳啟迪還談到「女孩子化妝低齡化，甚至到了四五歲的年齡」。而這兩點，恰恰是女權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過去女權發展的一百年裡，女權覺醒和崛起的兩個關鍵內容：一是經濟獨立，二是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經濟獨立，體現較爲明顯，比如職業女性；但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並不明顯，甚至在商業女色消費時代，又有回流跡象。女大學生「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傍大款」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經濟獨立的倒流：從獨立回到依附、從社會回到家庭。而一旦沒有經濟獨立，女權意識就不復存在。

而在「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則加重了這種存在。把女性作爲一種消費對象，這是商業時代的一個大問題。典型莫過於《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廣告、時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被女權主義者大批特批的。化妝，雖然是女性愛美的表現，但也是社會把女性視作漂亮的消費對象的結果。

可以說，吳啟迪所言女大學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是女權教育的必要。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爲「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釋，爲「傍大款」找「愛的理由」，甚至列出諸多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熱鬧固然熱鬧，但無疑是偏離了主題。自信自立自強的女權教育，被淹沒在這些風一吹就乾的口水裡。

環境污染罪

□紀卓瑤

2009年7月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趁汛期偷排化工廢水污染南涑河流域，有毒廢水嚴重影響流域內50萬群衆的生命健康和生產生活。近日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億鑫化工有限公司負責人有期徒刑15年。

應當說，15年有期徒刑與造成的危害和損失相比刑責相當。但值得關注的是，山東臨沂億鑫化工有限公司並非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定罪，而是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定罪。

所謂投放毒害性物質罪，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爲；而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則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導致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行爲。

乍看起來，二罪都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但構成要件卻完全不同。前者屬於「主觀故意」，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而後者在主觀方面則爲過失，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侵犯的客體爲國家環境保護和公民環境權。具體就億鑫化工有限公司污染事件而言，明顯具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特徵。

對環境污染事件以投放毒害性物質定罪，明顯有悖「罪刑法定」原則，爲何法院審理時還要執意爲之？說到底，還是重大環境污染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責太輕。

所以，必須盡快對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條文進行重修。否則，在法官審理環境污染案時難免向投放毒害性物質罪上靠，最終導致法將不法的嚴重後果。



9日，在重慶師範大學舉行的「女科學家高層論壇」上，與會的女科學家們認爲，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女大學生們完全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做到既「做得好」又「嫁得好」。

女性的智商與男性沒有區別；算女大學生自己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應該說，這是一堂標準的女權教育課，它的目的是讓女大學生自信自立自強。但很遺憾，人們把目光聚焦在與會的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上。

的確，在談感情變得奢侈、「談錢」大有壓倒「談愛」之勢的現實裡，女大學生「傍大款」不僅成爲一種現象，人們也往往容易爲之找到各種聽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愛錢」結合，「傍大款」也未嘗不可。但問題是，吳啟迪所言「傍大款」，是「幹得好」不如「嫁得好」觀念的體現。

其實，在新聞裡，除「女大學生「傍大款」是一種悲哀」外，吳啟迪還談到「女孩子化妝低齡化，甚至到了四五歲的年齡」。而這兩點，恰恰是女權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過去女權發展的一百年裡，女權覺醒和崛起的兩個關鍵內容：一是經濟獨立，二是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經濟獨立，體現較爲明顯，比如職業女性；但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並不明顯，甚至在商業女色消費時代，又有回流跡象。女大學生「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傍大款」的做法，顯然是一種經濟獨立的倒流：從獨立回到依附、從社會回到家庭。而一旦沒有經濟獨立，女權意識就不復存在。

而在「告別作爲消費對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則加重了這種存在。把女性作爲一種消費對象，這是商業時代的一個大問題。典型莫過於《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廣告、時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被女權主義者大批特批的。化妝，雖然是女性愛美的表現，但也是社會把女性視作漂亮的消費對象的結果。

可以說，吳啟迪所言女大學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妝低齡化現象，是女權教育的必要。但遺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爲「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釋，爲「傍大款」找「愛的理由」，甚至列出諸多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熱鬧固然熱鬧，但無疑是偏離了主題。自信自立自強的女權教育，被淹沒在這些風一吹就乾的口水裡。